



跟大师学国学

吕思勉 著

中国政治思想史

中华书局

D092
118



跟大师学国学

吕思勉 著

中国政治思想史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政治思想史/吕思勉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6.6
(跟大师学国学)
ISBN 978-7-101-11796-7

I.中... II.吕... III.政治思想史-中国 IV.D0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3720 号

书 名	中国政治思想史
著 者	吕思勉
丛 书 名	跟大师学国学
责任编辑	李洪超
出版发行	中华书局 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 http://www.zhbc.com.cn 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	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	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	开本/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5 ⁵ / ₈ 字数 110 千字
印 数	1-6000 册
国际书号	ISBN 978-7-101-11796-7
定 价	23.00 元

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

——“跟大师学国学”出版缘起

这是一套写给年轻人的国学读本。

“国学”之名，始自清末。其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，号为“新学”、“西学”等，与之相对，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“旧学”、“中学”或“国学”等。

晚清民国时期，东西方文化会通碰撞，人文学术勃兴，产生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。他们的著述，历经岁月洗磨，至今仍熠熠生辉。我国古代经典，浩繁艰深，而这些著作无异于方便后人接近经典、了解历史与文化的一座座桥梁，其价值自不待言。

遗憾的是，出于诸种原因，这些著作，有的版本繁多，错漏杂见，有的久不再版，一书难觅。有鉴于此，我们特组织出版“跟大师学国学”书系，从中遴选出一些好读易懂、简明扼要的作品，仔细编校，统一装帧，分批推出，以飨读者。

这些作品，大多是一版再版的经典，不仅在文化学术界历来享有盛誉，也在广大读者中间有较高知名度；另有一部分，出自当日名家，影响很大，但1949年后未曾重印，借此次机会，将之重新推荐给大家。

这些作品，有的是为高中生所撰的教材，如张荫麟先生《中国史纲》；有的是为青年学生所作的讲演，如章太炎先生《国学概论》和梁启超先生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；有的是应约为青年人写的通俗读物，如吕思勉先生《三国史话》——都是大家名家面向年轻读者讲述，不作高头讲章，也不掺杂教条习气。这正应了曹聚仁先生记录章太炎先生所作国学讲演时所说：

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，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：第一，他运用精利的工具，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；第二，他站在前面，指引途径，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。

这也是本书系立意所在——让年轻一代享受大师们的文化成果，学习大师们的治学方法，感知大师们的智慧才情。朱自清先生说得好：“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，而在文化。……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，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，也有接触的义务。”这对当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，也许是一个并不过时的提醒。

我们希望，这些作品能在新的时代，帮助年轻朋友熟悉经典，认识中国的历史与文化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9年4月

前 言

网络上有人问道：“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，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；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，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。这两句话出处何在？在吕思勉的哪篇著作中？”其实，这两句话，就出于这本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上。

吕思勉先生现在已为学术界所熟知，说起他的代表作，自然是《白话本国史》、《吕著中国通史》、《吕思勉读史札记》，还有四部分量很重的断代史。其实，除了这些大部头的专著之外，吕先生还有许多学术性的文

章、讲稿，也很值得重视。它们通俗易懂，又不失学术性，最适宜用作初学者的入门书，即使是专门的研究者，读了也不会觉得浅。浅而不陋，是此类文章、讲稿的特点，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就是其中之一。

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原名《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》，是一九三五年吕思勉先生在上海光华大学的演讲，当时由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先生记录，刊登于《光华大学半月刊》（第四卷第五期至第五卷第四期，1935.12—1936.12），刊出时署名为“吕思勉讲，吕翼仁记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吕翼仁先生曾做过一些校对和整理工作。一九九七年收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吕思勉遗文集（下）》，后又收入天津古籍出版社的《名师讲义》丛书、凤凰出版社的《近代学术名家大讲堂》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《吕思勉文集》^①。可见这一篇演讲稿，已受到学界的重视。不过，上面的两句话，还是由于学者撰文时的引用而引起大家的注意^②。

与我们今日动辄数十万字的巨著相比，作为演讲记录的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只是一本七万字的小册子，但其内涵的学术性却并不“单薄”。书中的不少论断，新颖独到，富有启发。比如第一讲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分期，说中国虽是一个政治发达的国家，但由于历史上周边民族的文化不甚发达，缺乏比较，所以，几千年来的政治议论，都系针对实际政务，而未能涉及政治的根本问题。这与古希腊的政治思

① 即《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》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）、《吕思勉讲思想史》（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）、《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《吕思勉文集》，2009年版）。

② 张旭东：《吕思勉的“执微”》，《中华读书报》，2009年1月14日。

想大不相同。第四讲讲先秦诸子的思想，说对于先秦诸子历来都是称颂的多，批评的少。吕先生认为，“假使先秦诸子，而真见用于世，见用于社会，而真本其所学以行事，其结果，怕会弄得很糟的”。至于“法家之学，在先秦诸子中，是最为新颖的，最适合于时势的”，但它也有落伍之处。它的落伍之处，便是不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区别。“社会的利益，彻头彻尾，都可用国家做工具去达到，就有将国权扩张得过大之弊”，秦并天下之后，不改变政策，最终导致灭亡。然此灭亡非秦皇个人之过失，“而是法家之学必至的结果”。说道家主张的“无为”的“为”字，不能解释为“作为”，“为”的意思是“化”，“无为”就是“无化”，无为而无不为，就是无化而无不化，就是主张任民众自化，而不要去干涉他、变化他。“化而欲作，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。”至于汉得天下，道家思想得势，所行的就是放任主义。放任主义的长处，就是维持现状；而说到改进治化那就是南辕北辙了。

书中也有不少新颖的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，很值得我们学习。如第三讲论上古社会的演变，借用夏商周三代“贡”、“助”、“彻”的演化来论述上古时代部族的融合；借用契丹民族史的材料，来阐述古代社会阶级对立的具体状况，等等。书中还有许多特别的考证，往往涉及训诂、文法等专门的知识。如说古代社会的“寓兵于农”，特地指出这个“农”字，是指农器，不是指农夫。“寓兵于农”就是以农器为兵器，不是以农夫为军人。如“伏羲”二字，意为“下伏而化之”，不能因为有“驯伏牺牲”的说法，而视其为游牧时代的酋长。此外，“君”与“王”的差异，“臣”与“民”的不同含义，文献上

“民”、“氓”、“百姓”的联系和区别，甚至司马迁《史记·平准书》上有关汉武帝时“人给家足、库府充实”那段记载如何解读，等等，都有专门的解释，这对于我们阅读文献、理解史事是很有帮助的。而上面列举的那些新颖独到、启人深思的论述，有许多只是粗启其端、引而未发（如说王充《论衡·治期》篇“力言国家之治乱，与君王的贤否无关”；说汉唐用兵之不同等）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由此引出不少史学研究上的好题目。

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原是面向大学生的学术演讲，故文字通俗浅近，条理分明，一些难懂的或易于引起误解的地方，作者都有专门的解释，故这一本小书，读者在阅读上是没有太大困难的。但是，历史著述的阅读，并不是文字、句子上读懂就可以获得真理解的，它往往还需要有读者的阅历、生活经验，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体验、感受等因素的配合。所以，同样的一本书，因年龄、阅历的不同，就会产生不同的阅读体会。

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我已读过好几遍了，此次中华书局要刊印单行本，我又把它重新校读一遍。而给我刺激最深的是第五讲中关于“帝制成功，君政废坠”的论述了。中国历史上周秦之间的“千古一大变”（王夫之语），今日已成史学界的常识，几乎人人会说。但这个“千古之变”究竟变在哪里？论者自然是见仁见智。吕先生的看法颇为独特。他认为，周秦间的历史变化最重要的可以概括为“帝制成功，君政废坠”八个字。他说：在远古时代，社会小，事务简，群体内的利益较一致，设“君”而为民，并非一句空话。“君”的职责就

是把小群体内的事情——最主要的是民众的相生相养的事情措置得件件妥帖。这就是荀子所说的“君者，善群也。群道当，则万物皆得其宜，六畜皆得其长，群生皆得其命”。虽然那时的“君”未必个个都能如此，但就社会制度论，只要有仁君，行仁政，确是可以做到这一步的。但自统一以后，社会体段太大了，社会的情况也极其复杂，“君”的地位扩大到了“王”、“帝”之后，原来“君”所能治的事情，“王”、“帝”则无法可治了；即使是所谓“亲民之官”如县令，要他们尽“君者善群”的责任也是做不到的。于是，民众相生相养的事情遂无从过问，民生遂呈现为极其萧索可怜的状况。这不能不说是帝制成功后带来的一个缺陷。

当然，已经形成的大帝国，不能再退回去斫而小之，况且统一也有许多有利的方面，只是勉强统一，且它的治法还未完善。他说：中国历史上的治者阶级，在封建时代，是世袭贵族；在郡县时代，则是官僚阶级。官僚阶级在其初起之时，确能代表民众帮助君主来抑制贵族的，所以在当时，任用官僚，废除贵族，除了贵族之外，怕没有人会反对的。等到贵族阶级崩溃之后，官僚阶级取而代之，它便成了治者阶级，这时候，其利益便与民众相反了。凡阶级，总是要以其阶级的利益为第一位的。官僚阶级里并不是没有好人，也自有不怠惰、不贪污的人；但是“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，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；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，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”，所以官僚阶级的性质就是：所尽的责任，越小越好；所获的利益，越多越好。怠惰与贪污，乃是官僚阶级的本质。官僚一旦成为治者阶

级，那他也就是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阶级。于是，社会上稍有才力的人，都是竭力要挤进这个阶级中去，而民众方面所剩下的，都只是既愚且弱，除了束手待毙，只有以暴动为反抗了。官僚政治是离不开督责的，历代所谓“严以察吏，宽以驭民”，就是以法家的督责之术对付官吏，以儒家宽仁之政对待人民。如果不能以督责之术来约束官吏，那无异于放纵百万虎狼于民间了。然而，人是监督不尽的，官吏在监督不及之处，便要作弊自利了。而随事监督之，势将劳而不可遍。为此，国家所办的事，宜定一个最大的限度，超出此限度的，听由社会自治、民众自办。他曾写过一篇《如何根治贪污》的文章，认为：“只有以更多数的人民，监督多数的官吏，能使之不能作弊，不敢作弊；只有人民自己办自己的事，能定出适合于实际的办法来，使人可以遵循。在此两个条件下，则地方自治的发达，实为对治贪污的根本之计。”^①

周秦之间的“千古一大变”，有学者从礼制风俗上论述，有学者从军事战争上（从“以礼为固”到“兵不厌诈”）来叙说期间的变化，最常见的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演化来解释周秦历史的变化，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视角。然总不及从政治与民生关系的分析，更能贴近我们的生活，也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。当代史学家常常强调古今间的双向关系，强调历史与现场的两相关照。行文至此，想起了吕先生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。他曾对青年读者说：读书万卷，若不能配合着

^① 《如何根治贪污》，刊于《吕思勉文集·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455页。

现实，有时候，书中所载的事情，你还是不能深切了解^①。读书最要紧的是“先得要知道书上所说的，就是社会上的什么事实。如其所说的明明是封建时代的民情，你却把来解释资本主义时代的现象；所说的明明是专制主义的治法，你却把来应付民治主义时代的潮流；那就大错了。从古以来，迂儒误国，甚至被人哂笑不懂世事，其根源全在于此”。所以，读书须将书中的叙述、记载，与自己的阅历所得，合同而化，融会贯通，这才是人世间的“真学问”^②。俗话说“开卷有益”，又说“读史使人明智”，学会了吕先生的这种读书方法，庶几可以近之了。

本书的附录有三：第一篇“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思想”，取自吕先生《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》的第八章^③。《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》初版于一九三五年，节录的第八章专论先秦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。第二篇“鸦片战争前之国内情形”，取自吕先生《中国近百年史概说》的第三章^④。第三篇“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”，取自吕先生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的第一、二章^⑤。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原是吕先生任教光华大学时所撰的讲稿。节取的这二个章节，都是从政

① 《读书与现实》，刊于《吕思勉文集·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440—441页。

② 参见《读书的方法》、《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学习历史的方法》，均刊于《吕思勉文集·吕思勉论学丛稿》，第442—444、577—584页。

③ 《初中标准教本本国史》，收入《吕思勉文集·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925—1280页。

④ 《中国近百年史概说》，收入《吕思勉文集·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27—258页。

⑤ 《中国近世史前编》，收入《吕思勉文集·中国近代史八种》，第143—226页。

治、社会两个方面对中国传统社会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，正好用作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背景资料。读者也可以先读附录，即对传统社会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，再来阅读正文，或许能获得事半功倍的阅读效果。《中国近百年史概说》的第二章“中西交涉之初期”，也可以用作延伸的阅读资料，因为这方面的历史史实，只有在专门性的学术著述才有叙述，而一般的历史读物都语焉不详，此篇文字简明、要言不烦，可以用来补充我们这方面的历史认识。

张耕华

二〇一一年八月

目 录

前 言	1
第一讲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分期	3
第二讲 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之两派	7
第三讲 上古到战国的社会变迁	11
第四讲 先秦的政治思想	21
第五讲 秦汉时代的社会	51
第六讲 汉代的政治思想	61
第七讲 魏晋至宋代以前的政治思想	77
第八讲 宋明的政治思想	87
第九讲 清中叶前的政治思想	109
第十讲 近代的政治思想	115

附 录

春秋战国之学术思想	127
鸦片战争前之国内情形	133
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	137

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，民国二十四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所讲，子女翼仁笔记之，而予为之订补。以阅时甚暂，故所讲甚略，特粗引其端而已。虽然，古之所贵乎朋友讲习者，曰讲明。学者于义有所不彻，教者罕譬而喻焉，曰讲贯。既习其数矣，而未能观其会通，故教者为引而信之，触类而长之也；故曰：予非多学而识之，予一以贯之者也。专门之士，穷幽凿险，或非圣人所能为。然覆杯水于堂坳，则芥为之舟，置杯焉则胶，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弗为也。况于翻检钞录，又不足以语于致曲者邪。抑闻之，古之为政者，必立谏鼓，置谤木，岂不知忠言之逆耳，谗谄面谀之快于心，虽睿智，思虑有所弗能用；虽聪明，耳目有所弗能及。是以用众以自辅，求贤以自鉴，而不蔽于其所亲昵也。若乃将直言极谏，与诽谤同科。举国计民生，惟党徒之殉，弗思耳矣，亦已焉哉。云南起义前夕自记。

第一讲 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分期*

中国的政治思想史，是颇为难讲的，因为：

（一）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同。政治制度，是有事实可考的，历代都有记载。记载自然有缺漏，但是一件事实，缺落其一部分，或者中间脱去一节，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，自然有人去研究，用考据手段去补足他。政治思想则不然，他是存于人的心里的。有许多政治思想，怕始终没有发表过；即或发表过的，亦不免于佚亡；

* 标题系编者按每讲的内容所添加。